



■内蒙古日报记者 侯瑞 摄

# 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一幅壮阔的生态图景

## ——评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

■张瑞坤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作为模范自治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英雄小姐妹”“各族人民建包钢”等民族团结的故事在内蒙古大地传为佳话。重现这些往事，有很多表达方式，比如，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等。不同的表达方式，都会给传播对象带来不同的感受，但其主题永远是民族团结。《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取材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用小说的形式书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通过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相互交织的讲述方式，聚焦希吉尔一家的日常生活，在日常叙事中又折射了宏大叙事。胡斐作为一名内蒙古籍青年作家，扎根生活，用勤奋与智慧，执着于自己的文学梦想，曾发表《赤峰百柳》《红色宁城》《菊们的礼物》等具有乡土性、历史性、艺术性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包含着她对日常生活的体察、对于时代精神的体认。

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以文学的形式再一次呈现了历史真实，相对于历史真实而言，文学作品更注重情感表达、场景描摹和情节设置的真实。写作结构是小说谋篇布局的核心内容，《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作品的写作结构围绕“主人公希吉尔情感世界转变”展开书写，“希吉尔！希吉尔！希吉尔！”，诺敏（额吉）一连串呼喊像一颗颗小石头，响亮地投向空中。诺敏

（额吉）对希吉尔的三声呼唤开始了民族大团结的书写。“希吉尔”的蒙古语的意思是“发光、发亮”，名字不仅寄托着草原人民对孩子美好的祝愿，也隐喻着世代相传的爱接力。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主人公希吉尔初到内蒙古，就被诺敏（额吉）身上的青草味、奶味和肉香混合的气息所吸引。他毫不犹豫地把手伸了出来，那一天在希吉尔心里是甜甜的一天，是美的一天。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火山似的骆驼、凶猛捕猎的雄鹰、腾空而起的骏马……这一切让希吉尔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恐惧。再加上希吉尔与特木尔（阿爸）之间，因为误会产生的小小裂痕，都让希吉尔心里忐忑不安。作者胡斐以“潜入人物内心深处”的书写方式描摹了一个幼小生命的环境焦虑和成长焦虑。额吉的温暖细腻，奶奶的慈祥宽厚，为救治高烧的希吉尔，阿爸风雪夜外出寻医，斑布从排斥希吉尔到形影不离……这一切让小主人公希吉尔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很显然，希吉尔所遇到的难题，在这“三千孤儿”当中并不是孤例，因为，“那些把南方孩子揽入怀中的额吉、阿爸，有的守着草场放牧羊群、骆驼群，有的生活在城镇，有稳定的职业，但不管身份如何、年龄如何、家庭收入如何，他们都把更多的偏爱给了这些孩子。”这些心怀大爱的内蒙古人陪伴这些孩子们缓解焦虑，直至彻底打开心扉，这正是内蒙古人民的善良、博爱和无私奉献的体现。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在亲人温

暖的怀抱里，希吉尔对于生命的体认不断拓展，不断调整对于成长的认识。当读者们感悟到希吉尔成长的足迹，这足迹不仅属于希吉尔个人的生命记忆，更属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文化认同的基础，起到了凝聚人心作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以辽阔草原上普通的一户人家作为描写对象，以孩童般的唯美气息和抒情口吻讲述了“国家的孩子”来到内蒙古逐渐适应草原环境，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如果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认知角度来分析，小说也在讲述“国家的孩子”来到草原后的心路历程，孩子们从不安到慌张，从陌生到融入，情感得以落实，心灵找到归宿，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这生命之花是党和国家呵护的结果，是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结果，是亲人们之间共同守护的结果。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不仅是一部书写人间大爱的佳作，也是一部对话自然的生态美文。“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和结果。草原人民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不是从观念出发的，而是从生活的点滴中生长出来的，每天都在自然万物中感受爱，看到

美，这种天人合一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比如，小说的主人公希吉尔刚来到草原，格根塔娜奶奶告诉他骆驼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家里的老骆驼完成希吉尔寻医的任务之后，轰然倒下，平静离开，家人以回归大自然的方式送别了老骆驼，这是对老骆驼的尊重。再如，希吉尔来到草原后，便开始广泛地接触大自然，并以友爱的、深情的、欣赏的脚步迈向大自然。他观察搬运奶酪的蚂蚁，敬畏翱翔云端的大雕，照顾一出生就带有缺陷的小羊羔，和猎狗成为好朋友，骑着骏马阿日斯兰在草原上驰骋，放走雪夜入侵羊圈的小狐狸……这种淳朴、简单、诗意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浸润着这颗幼小的生命，这一切和亲人们的爱心共同构筑成少儿温馨的情感世界。正如作品前言中所言：“站在风的耳语里和草的清香里，骑在白马和骆驼上，跟随着额吉和阿爸，穿过辽阔的爱的大地。”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创作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中，胡斐的创作过程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融合。小说以希吉尔作为典型人物，日常生活作为描摹对象，历史佳话作为创作背景，艺术地呈现了一个包容、团结、博爱、纯真的美好世界，这份美好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

（据《内蒙古日报》）



# 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

## ——读长篇小说《人间信》

■徐阿兵

“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中国作家麦家对法国作家马拉美的这句话印象深刻。这句话几乎可视为文学事业的写照。对所有作家而言，正是对生活经验的深入开掘、对文学技艺的反复磨砺，才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事业。作家的艺术使命，就是竭尽自己的经验和技艺，尝试写出一本理想的书。作家的创作生涯，整个儿就是一本大书。就个体作家的风格特色而言，其创作个性和实绩往往以某“一本书”备受肯定为标志。所谓的成名作、代表作，均是特殊的“一本书”。这句话也是献给真正的文学创新创造者的箴言。假如一位作家不满足于过早被某“一本书”所定型，他就有必要写出“另一本书”。2019年，麦家推出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因对故乡和童年记忆的集中表现而被认为是创作转型的标志，但这部作品对蒋正南形象的塑造其实仍延续着英雄传奇的叙事惯性。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年4月推荐书目），进一步疏离熟悉的题材和人物形象，真正实现了另辟蹊径。这或许是标志着麦家转型成功的一本书。

读完《人间信》，笔者深切感受到，麦家已倾力将他所感知的“世间的一切”摄入这“一本书”。在20余万字的篇幅中，一座偏远小山村的现代史，一个家庭的存续与变迁，一对父子间的冲

突与隔阂，一些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与爱恨纠缠，共同交织成人间画卷的一角。既然小说叙事容纳这么广泛，那么“人间信”这简简单单三个字能否统摄全书？事实上，汉语表达所具备的简练和精深之长，足以消除上述疑虑。单从“信”字来看，无论被用作名词意义上的书信、音信、凭信，还是动词意义上的相信、信从、信仰，或是形容词性的诚实不欺、准确无误、真实可信，“信”都联结着特定的人际关系，并指向明确的价值观念。展开来说，书写“人间”与“信”的遇合，可谓作家分内之事，而探究作家的叙事旨趣，则是读者的职责所在。

如果“信”是音信，“人间信”则是人间的消息。人间本是浑然一体，芸芸众生共同沐浴阳光雨露。但在广袤大地之上，山川阻隔，语言分化，风俗各异，以致不少人所认识的人间不过是一角，甚至很难与其他地方音信畅通。小说中的双家村正是这样的人间一角。在很长时间内，“我”即将富春的家，父辈所能接触的外部世界，其边界不过扩展到街上和镇上，但双家村绝非远离人烟的桃源胜地；外国侵略者到过这里，以致“我”的父亲年少时曾被抓走又逃回；阿根大炮家先后有两个儿子从这里出发寻找部队；知青娄老师等人到过这里，革命浪潮也从未忽略这里……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双家村作为文学地理空间已初具规模，未来甚至可能发展为个人化的文学标记。但就目前

而言，双家村并不以富于地方性的风土人情而独具一格，是广阔人间的缩影。不少人尝试过以极端方式离开双家村：奶奶离家出走，“我”从这里应征入伍，大姐和小妹远嫁外地。但他们最终或回到这里，或身在他乡而心系此地。双家村之所以令人爱恨交加却又无法真正摆脱，不仅因为它是那些人的故乡，更因为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小说并不以书写民族史、村庄史或个人成长史为追求，而是从容有致地记述人间常有的各种消息。

“信”若解读为相信，“人间信”则关乎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作品中的许多人，或许身份不够显贵，但都有自己的生活信念。母亲在重病时仍为游手好闲、毫无责任担当的丈夫百般开脱，这何尝不是一种“信”？正因此始终相信丈夫只是不成器而不是坏，她才能做到与十年含辛茹苦操持家庭。蒋富春与父亲的巨大冲突，很容易被解读为少年的叛逆行为所致，其实根源在于父爱的缺失。成长道路上，父亲基本上是没有缺席的，蒋富春没有榜样力量的引领，他不自觉地要成为榜样，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才真正放下往事。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过，人间的故事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都会透露“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残疾即残缺和限制，意味着残酷的现实。爱情则是梦想和对完美的企盼，意味着对残缺的补救。在残缺的现实面前，人依然葆有梦想并为此努

力，这就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人间信》写了那么多冲突、矛盾、误会、遗憾，却依然带有光亮和温热，正因它敢于直面生活的残缺，并坚持从普通人身上发现信心和勇气。

“信”若解读为真实可信，“人间信”则意味着小说所叙述的人间图景真实可信。在新媒介时代，置身图像和声音叙事之中，小说家如何以文字叙事建构艺术真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人间信》中，麦家对文字叙事独特性的充分认识，体现为对小说叙事技艺的自觉运用。比如，在叙述视角上，前半部分以“我”的口吻讲述不成器的父亲如何屡次令人失望，这在叙述合法性上原本不无疑问，但叙述者时常引入“阿山道士说”“奶奶说”“母亲说”，不仅强化了叙述合法性，还使叙述过程本身变得摇曳多姿。小说还有意识地创设对话与互文的情境，以此引领读者在故事之外思考小说的意义与价值，这在最末的“众声”部分表现最为明显。

《人间信》结尾处引述了诗人安妮·卡森的话：“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至于何为小说，叙述者却未正面回答。上述解读或可用作答案：小说既从容记述人间的音信，又坚持发现人间的信念，更致力于使自己的记述和发现真实可信。一言以蔽之，小说是人间之为人类的凭信。

（据《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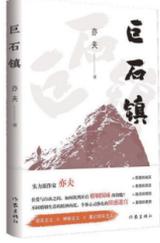


### 《巨石镇》

作者：亦夫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这是实力派作家亦夫的最新长篇小说，深入探讨了婚姻中的爱、恨、冷漠和无奈，诠释了婚姻中人们对自由与安全的渴望，以及掌握婚姻围城大门钥匙的理想状态。是兼具现实主义、神秘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一部杰作。

（据《西安日报》）



### 《山谷微风》

作者：余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余华最新散文集，收录12篇余华2024年新创作的文章，及17篇历年精彩文章，创作时间跨度40年，呈现了作家半生的历程与感悟。

（据《西安日报》）



六月出版。摘自《中国人文大义》，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 何为中国人文传统

推荐理由：“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是文化的核心，何为中国文化，绕不过何为中国人文。本书以短小精悍的形式，依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饱含反思与哲思，讲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文的传奇，以图文溯源历史，寻脉人文。从人文传统到当日常，从中国精神到西方人文，在这本书的叙述中，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中国人文的特质渐为清晰。人文和科技是社会发展的两翼，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人文传统尤为重要。本书短小的篇幅，却打通中西、沟通古今，有历史的厚重也有时代的呼唤。

“人文”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于《周易·贲卦》的彖辞。《贲卦》（下离上艮）讲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通过刚柔互相文饰的命题加以论证。其卦辞文和《象传》文字为：

贲，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传》通过“天文”和“人事”两方面，论证刚柔互相文饰的关系。天的本质不可见，而日月一往一来，交互错杂，文饰于天上，通过这种现象就可以认识天的本质。就人而言，有质（思想品质）与文（文明礼仪）的关系问题，通过文明礼仪可以反映人的思想品质，故“文明以止，人文也”——人的文明礼仪能止其所当止，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关系；能守其礼仪上的分寸而不逾越，便达到了“人文”境界。《象传》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结全句，意谓观天文日月刚柔交错的现象，就能察知四时寒暑相代谢的规律；观人的文明礼仪各止其分的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使人人能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吴徵对《周易·贲卦》的“文明以止，人文也”所作的注释为：“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礼’之秩，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时变谓四时寒暑代谢之，变化谓日月，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将“人文”诠释为以焕发的文采，繁然的典章制度使社会止其当止，而不是凭借威武之力去维持社会秩序。

《周易》中首出的“人文”一词，意指人际关系的准则，它的确是仿效刚柔交错的“天文”的结果，却并非人格神祇的任意，同希伯来《旧约》中上帝耶和华向摩西宣示的神与人的“约法”大不一样。如果把《旧约》的法则称为“神文法则”，那么，《周易》的法则是“人文法则”。自周代以降，中国便确立了与天道自然相贯通的人文传统，形成一种“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性格。

14世纪至16世纪，以复兴湮没千年之久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外观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进而扩展到整个西欧。此前，欧洲曾发生过多次“文艺复兴”，如公元8世纪、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次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大文艺复兴”，具有文化转型意味，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冲击封建罗网的要求，高张 humanism 旗帜，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其著名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并由此倡人权，以与中世纪君临一切的神权相抗衡。以此为开端，意大利各大学增设修辞学、哲学、天文学等世俗学科（即人文学科），从而对神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地位提出挑战。文艺复兴运动还针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力主追求人的现世幸福，论证个人自由发展的合理性。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的人性论与个人主义，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市民世界观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走出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先声，而 humanism 则被视为欧洲近世文化精神的前奏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论及“中古时代”晚期的“古学研究”时，对“人文”作了这样的表述：

“人文”这个词是富于意义的，因为在那些古学研究中，人类的东西和人类的文化受到了尊重。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的真谛。至20世纪初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欧洲文艺复兴思想介绍到中国，《国粹学报》屡称文艺复兴为“文学复古”；蒋方震（1882—1938）1924年出版《欧洲文艺复兴史》，以“再生”概括文艺复兴精神。也有学者体悟到文艺复兴在“复古”外观下包藏的“开新”深意，认识到历史的“进步又非为一直线”“其像如一螺旋”，并以此比附清学，认为清初、清中叶、清末几次学术转折与文艺复兴相类似，均是“以复古为解放”。但现代中国知识界何时由何人正式将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 humanism 译成“人文主义”，尚待考证。朱维铮（1936—2012）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胡适（1891—1962）1917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时，主张用“再生时代”翻译“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

最后，非常可奇异的是，这场新的运动都是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由此推断，以“人文主义”翻译文艺复兴主流 humanism 当在1917年以后，1933年以前，而且，这位译者也是“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具体而言，是懂得“人文”一词在中华元典里的本来含义的。

中国的人文传统，颇具“早熟性”。远在文明时代初期的殷、周交替之际（距今约三千年），周人便开始突破商人的“尊神重鬼”，走向“远神近人”“天视自我民视”的观念应运而生，至晚周更是蔚然成风。先秦典籍中的“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便是中国式人文精神的初期表述。《左传》《孟子》诸书阐扬的“天道远，人道迩”“民贵君轻”之类民本思想将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发挥到极致。后来会合成中国文化主流的儒、法诸家，“舍诸天运，征乎人文”，都以现实政治、人间伦常为务，乃成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

传习中国文化，不可不从“人文”精义入手。中国的人文传统，约略可以概括为——“人文”与“天道”契合；虚置彼岸，执着此岸；伦理中心与经世取向；一体两翼的“民本”与“尊君”；“敬祖”与“重史”；文化人薪火相传……

这些特色，早在先秦即已形成，又在此后两千余年间生发、拓展，且因革。以下试作分论，并与西方人文精神简单比较以便更为明晰，且对人类未来的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作一展望。

（据《天津日报》）